

010059

晋江市志

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
上海三联书店

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
福建省

晋江市志

上

主编 陈苗
副主编 庄维坤

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
上海三联书店

责任编辑 张洪怡 江城
秦楚梁 凉
封面设计 张苏予

晋江市志

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

生活·读书·新知

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
上海绍兴路5号

上海群众印刷厂照排、印刷

1994年3月第1版

1994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787/1092 1/16

印张:117.75 插页:28 字数:2,820,000

印数:1—5000

ISBN7-5426-0698-0/Z·62

上下两册 定价:120元

序 一

经过6年的辛勤耕耘,新编《晋江市志》终于和大家见面了。这是历史的记录,时代的新篇,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。她的问世,是晋江历史上的一件盛事,是值得为之庆贺的。我生于晋江,长于晋江,又服务于晋江。晋江与我,犹如母子情深。在《晋江市志》定稿之际,我阅读了全部文稿,倍感亲切与受益。

《晋江市志》是晋江的一部“百科全书”,既客观地记载晋江古往今来的地理民情,又如实地记述晋江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;既记录晋江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,又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,前仆后继的光辉业绩。它对于各级干部来说,如同一部“资治通鉴”,有助于我们了解市情,察古通今,增强政治远见,实行科学决策;对于广大人民群众,特别对青少年,是一部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。对于曾经在晋江这块土地上战斗和工作过的革命老前辈来说,从中可重温昔日的峥嵘岁月,激起美好的回忆和对晋江人民的眷恋之情。

《晋江市志》也是一座沟通海内外晋江人的“桥梁”。晋江是我国著名的侨乡,又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。据统计,在海外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的晋江人达200余万人,远远超过现在本市的人口。我十分高兴地读到新编《晋江市志》中的华侨、晋台关系、外经外贸卷,这是我们《晋江市志》的特色,是应该大书特书的。它不仅反映我们晋江先人为生活所迫,飘洋过海,寻求出路的艰辛历程;而且,也为今天华侨以及台湾、港澳同胞寻根问祖提供可靠的依据。同时,从这些篇章的字里行间,我们还可以看到海外乡亲热爱故土、造福桑梓的拳拳赤子之心;可以听到海外乡亲与家乡人民携手并肩,共同振兴晋江的脚步声……。我相信,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,一定会为她的出版而热烈欢呼!一定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深受鼓舞,继续为晋江谱写新的篇章。

今年是我们晋江历史上最光彩、最难忘的一年。3月6日,国务院批准晋江撤县设市。她结束了具有1275年的晋江县制的历史。晋江市的设立,既是晋江县历史的延续,又是晋江走向世界、走向未来的新起点。

钟灵毓秀的晋江,哺育了一代勤劳、聪明、勇于开拓的晋江人,在历史长河中,无数志士仁人,为了晋江的繁荣与发展,艰难探索,矢志进取,创造了光辉的业绩,也创造了晋江文明。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晋江人民认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,弘扬“诚信、谦恭、团结、拼搏”的晋江

精神,敢想敢干、锲而不舍,在晋江大地上开拓出一条振兴之路、发展之路、幸福之路,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晋江速度、晋江效益。出现了建国以来经济实力增长最快、发展生机最旺盛,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。我很赞赏,亚洲晋江社团联合会会长王为谦先生在5月1日晋江市成立庆典大会上讲的这么一段话:他说“自公元718年起,晋江建县已一千多年的历史,千年的风雨说不尽我们祖先所经受的困苦,千年的奋斗赢来了今天小康的生活景象,人们感受到晋江的巨变,这一变化是切实而深沉的,它是人们再一次解放自己命运,释放本身潜能并藉以改造旧世界,创造新世界的历史性变化。每当我看到晋江的变化,或者向国内外人士谈起晋江的变化,我往往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!当然,我不会忘记,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;归功于省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;归功于我们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的奉献!”

晋邑千秋,历沧海桑田,革故鼎新创伟业;

江涛万里,得天时地利,继往开来奠宏基。

晋江市的设立,将使我们晋江人民以其更加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气魄,吸纳人类社会一切科学的、进步的文明成果,顺应历史发展潮流,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,把晋江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侨乡城市。我相信,在不久的将来,晋江一定能够成为祖国东南沿海一颗璀璨的明珠,永放光芒!

在这篇序言搁笔之前,我应该感谢那些为编纂《晋江市志》而甘坐冷板凳、废寝忘餐、孜孜矻矻、默默工作的同志,感谢他们呕心沥血,再现历史,为我们提供教益。我们《晋江市志》的读者,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辛勤劳动的。当然,这部洋洋二百八十余万言的巨著,工程浩大,又时间匆促,错误在所难免,欢迎读者们批评指正。

中共晋江市委书记

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施永康

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

1992年12月

序 二

晋江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。早在新石器时期,古越族人便于此拓荒耕耘,繁衍生息。周秦以后,中原汉族逐渐南迁,迨西晋永嘉时期,中原战乱不息,晋人大举南移,据江而居,故名为晋江。晋江自唐开元六年(718)建县后,始终为泉州市之首邑。历史上,晋江辖区多有变迁。宋曾析东北地置惠安县。新中国成立后,晋江县又属地三析,另置鲤城区,石狮市,1992年3月,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晋江市,晋江行政区域的沿革,创造了一县成三市的历史奇迹,标志着在农村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了阶段性的飞跃。

晋江修志始于何时,目前尚难考订,唯明《永乐大典》存录旧志轶文二则。现存最早刊行本为乾隆三十年(1765)《晋江县志》。道光十年(1830),晋江县再次修志,但百余年未曾付梓,至1989年,始由晋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谬订伪,标断整理,刊印成书。今《晋江市志》历经六载,数易其稿,凡四十二卷,二百八十余万言,其功竟成,偿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之夙愿,为晋江市政治、文化生活中一大盛事。

晋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,枕山临海,东临台湾海峡,西与南安为邻,南毗厦门特区,北依泉州古城,地理位置得天独厚,曾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起点之一。山川秀丽,气候宜人,物产丰富,人文荟萃,其丰厚文化积淀,堪称“唐宋中原文化活化石”,素有“海滨邹鲁”之誉。历史上,人才辈出,文武兼备,先后出现了14任宰相,7位文武状元,1853名进士。著名政治家曾公亮、欧阳詹、苏颂;民族英雄郑成功,军事家俞大猷、施琅;科学家丁拱辰;思想家李贽、陈琛(紫峰);文学家王慎中;书法家张瑞图;高僧弘一法师等或生于斯,或长期寓居于此。近代,晋江是福建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方之一,革命斗争绵延持久,孕育出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等革命志士。新中国成立后,尤其改革开放以来,具有商品经济意识传统的晋江人民,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业绩,不啻为福建省对外经济主要基地和对台事务重要窗口之一,其经济综合实力居全省市(县)级首位,成为福建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,跃入全国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(市)行列。

晋江撤县设市,告别了具有1275年县建制的历史,翻开了划时代新的一页,跨上了建设侨乡新兴城市的历史进程。晋江市的成立预示着:古老文明的晋江必将英姿焕发,改革开放的晋江更具磅礴气势。晋江领八闽改革开放之先,得侨乡之益,凭政通人和之势,依团结拚搏之力,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昨天与今天;

勤劳、聪明、开拓、进取的晋江人,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,必将紧紧围绕“轻型外向,工贸结合,城乡一体,协调发展”这一既定目标,进一步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把握时机,拼搏创新,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步伐,开拓更加灿烂的明天,努力把晋江建设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、经济发达、高度文明、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侨乡新型城市。

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何锦龙
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

1992年12月

凡 例

一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,全面地、客观地、实事求是地记述晋江市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志书结构为分卷平列式。以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人文为序,分立 42 卷,前设概述,后置大事记和附录。记述以文字为主,图表为辅,照片集中于卷首,图表分别附在各卷之中。

三、上限一般从事物发端写起,溯源述流。下限原至 1988 年,后作补篇,延至 1992 年年底。

四、除华侨、晋台关系卷外,记述地域范围,198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为原晋江县所辖行政区划(含今石狮市),1989 年 1 月 1 日之后为晋江市现行行政区划。

五、记述中涉及历代政权机构、官职,均依当时习惯称呼。古旧地名,则夹注今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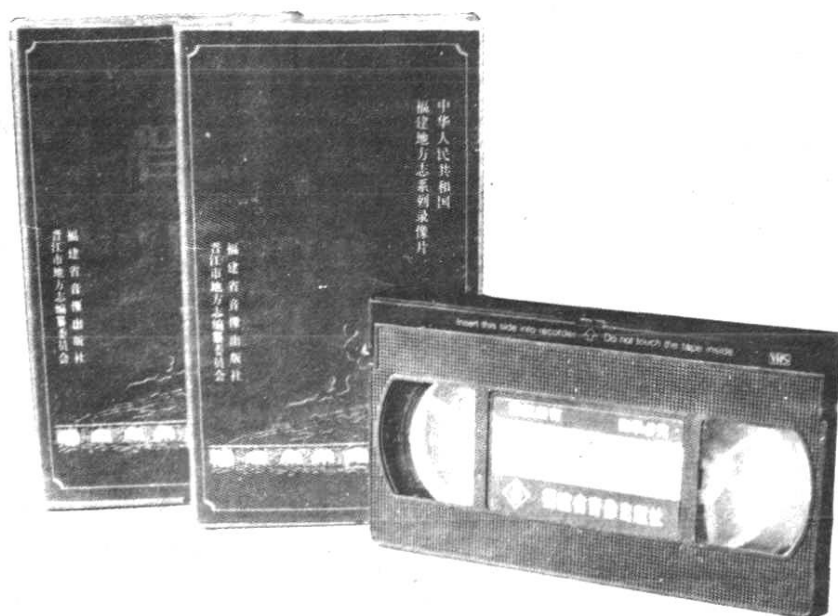
六、人物坚持“生不立传”的原则,收录对国家或地方有较大贡献、对社会发展具有影响的晋江籍人物,同时也收录对晋江有重大贡献或影响的客籍人物(1988 年前含石狮市人物)。人物传排列以传主卒年先后为序。

七、人物表录按一定规格收录历代职官,专业技术人员,华侨、华人和港、澳、台同胞名人,仕外人物,进士,革命烈士,英雄、模范、先进工作者等。

八、各朝代名称和年号沿用通称。历史纪年先书朝代纪年(含民国纪年),后来注公元纪年。同一年号,每节中只夹注第一次出现者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历纪年。

九、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。入志数据,以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。

十、晋江是著名侨乡。为方便华侨、华人和港、澳、台同胞阅读,志末收录简繁体字对照表。



概 述

概 述

晋江市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,东濒台湾海峡,西和南安县接壤,南与金门隔海相望,北同鲤城区毗邻,东北紧连石狮市。面积 649 平方公里,其中耕地 38.24 万亩。全市辖 15 个镇,1 个国营农场,823 个自然村。人口 94.12 万人,以汉族为主,少数民族有回族、畲族、满族等。

“海流城外青萝带,岩耸天边碧玉簪”。晋江枕山面海,山川秀丽。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,地形以台地、平原为主。西部呈脉状丘陵分布,地表起伏和缓。海拔 517.8 米的紫帽山,常因紫云覆盖其巅而得名,是境内的最高峰。晋东为冲积—海积平原,是水稻主要种植区。中部及南部为低丘、台地,是番薯、花生、甘蔗等旱地作物的主要产区。境内无大河发育,仅有 20 多条以低丘、台地为中心,呈放射状、自成单元独流入海的时令溪流。主要客水有晋江和九十九溪。晋江象一条蓝色的飘带流经市城北端萦回入海,九十九溪流贯市境,是晋东平原水网区的重要灌溉河系。龙湖、廍湖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市境东南部,是福建省著名的淡水湖。

晋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,日照充足,光热资源丰富,蒸发旺盛,季风显著。夏长不酷热,冬短无严寒。唐末韩偓的“四季有花常见雨,一冬无雪却闻雷”这一诗句,描绘出这里气候温暖宜人的特点。最热的 7、8 月份,平均气温在 28℃ 上下,最冷的 1、2 月份,平均气温在 12℃ 上下。全市各地年降水量累年平均 911.7—1231 毫米,常年年蒸发量超过年降雨量。夏季多干旱,5—10 月份常有台风侵袭。

晋江海岸线总长 110 公里,岩岸蜿蜒曲折,港湾良多,著名的有泉州湾、深沪湾和围头湾。晋江拥有海域面积 6345 平方公里,大小岛礁星罗棋布,是福建省主要的渔业生产县市之一。晋江物产丰富,土、砂、石等矿产资源蕴藏量大。海产资源有 200 余种之多,其中江瑤柱、石斑鱼、锯缘青蟹等 10 多种海珍品闻名遐迩。

晋江历来在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方面占有重要位置。在古代是举世闻名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重要的起点站之一,对外交通贸易盛极一时;晋江又是文教昌明、人才荟萃、声华文物的文明古县,素有“泉南佛国”、“海滨邹鲁”之誉;晋江人出国侨居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,祖籍晋江的华侨、华人遍布世界 50 多个国家与地区,是全国著名侨乡;晋江与台湾一衣带水,有深厚的地缘与血缘关系,是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;改革开放以后,晋江是“闽南金三角”经济开放区的主要县市,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迅猛崛起,并以其独特的发展形式和持续的发展速度,瞩目中外。

据考古查明,在距今 7000 年前,晋江市就有人类活动。春秋战国时期,古越族人在这里繁衍生息,陆耕海渔。周秦以来,始有汉人入迁。尤其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,中州板荡,衣冠士族为避兵燹,即纷纷南渡入闽。这些千里迢迢自河洛南来,筚路蓝缕的中州晋人,部分定居在今晋江两岸,他们为寄托对故土的怀念,遂把栖身之地的这条河流取名为晋江。从此,中原文化在晋江这块土地上扎根、衍化、递嬗。

大约经过 400 年的开发,晋江这个地方的面貌发生了变化。到了唐初,人口增长达 5 万左右,生产力也得到不断发展,以前是“茂木深翳”,“皆虎豹猿獠之墟”,这时已开始有“人稠地狭”之感了。唐久视元年(700),武荣州州治由丰州东迁泉州(今鲤城市区)。景云二年(711)武荣州改称泉州(即今泉州),州治无县,刺史冯仁知以此为由呈请置县,于开元六年(718),析南安县东南部置晋江县(因江得名),县治设于泉州,州县同治,从此晋江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。千百年来,勤劳、勇敢、富有拚搏开拓精神的晋江人民,凭藉这块历史舞台,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,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下,披荆斩棘,顽强不息地走出了一条晋江之路,勾画出古往今来、文明盛衰交替的社会发展轨迹。

晋江自建县以后,由于人口剧增,赖以生存的耕地日益不相适应,为此,人们就“向山要地”,“与海争田”。五代诗人所记“晋江两岸趁春风,耕破云山万千重”的诗句,是当时晋江人民辟山要地的生动写照。至于与海争田,规模、工程较大者,有唐太和三年(829)的天水准,以及五代围垦的陈埭等。历史上留下来的以渚、塘、埭、陂、洲、湾、屿命名的村落、田洋和水利工程,原来都是海潮起落之所。

耕地不断扩大,水利问题开始困扰着晋江人民。自唐贞元以迄南宋,晋江先后筑成尚书塘、仆射塘、六里陂、清洋陂、留公陂等水利工程,使大片斥卤之地变成良田。同时,在晋西南和中部丘台地带修建湖、塘 60 多处,以蓄汇地面水,引灌旱田,其中最大的有龙湖、廍湖、龟湖塘、湫田塘和大沙塘等。

在开发耕地、兴修水利的同时,人们一方面开始重视引种双季稻和进行农、蔬、果、副多种经营,并以“网罟为耕耘”,发展渔盐业生产。另一方面则开始挣脱土地桎梏,发展商品经济,并沿着这条奔流不息的晋江,走向海洋,进行海上贸易。于是,当时的后渚港和湾海(今安海)港便由一个普通的港湾发育成为通海码头。中唐以后,晋江县城泉州(今鲤城)出现了海外各国商贾云集、车马辐辏的盛况,成为“市井十洲人”的国际市场。

晋江海外贸易自唐至五代能迅速发展,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。尤其五代时期,自王潮及其后的几位继承者,都很重视海外贸易,王延彬曾为此而赢得“招宝侍郎”的绰号。王潮筑子城,留从效拓罗城,开辟通衢大道,构筑“云屋货栈”,也正是为适应这种贸易形势发展所需。

海外贸易不仅带动造船、陶瓷、丝麻等与外贸有关行业的发展,也促进文教事业的兴旺发达。唐贞元八年(792),晋江人欧阳詹与韩愈同榜题名,开了晋江人中进士之先河,此后,文教渐兴,读书中举的人逐渐增多,至唐末有 8 人中进士,五代也有 5 人。

宋太平兴国六年(981),晋江析东乡十六里另置惠安县。

宋元时期是晋江县城的鼎盛年代,它以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为特征。谢履的《泉南歌》写道:“泉州人稠山谷瘠,虽欲就耕无地辟;州南有海浩无穷,每岁造舟通异域。”反映了泉州对外贸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北宋元祐二年(1087)于晋江县城设置福建市舶司,徽宗时,又置来远驿,为大批外商的到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南宋前期,泉州已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关系。出口商品有衣料、器皿、食品、药物、杂货等 5 大类,共 60 多种手工业、农业产品,其中以丝绸、瓷器为大宗;输入的商品有棉花、棉布和象牙、玳瑁、玻璃、玛瑙、异香、胡椒等。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,晋江县城泉州成为世界东方一个重要大港。海外贸易为

南宋政府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,据载,绍兴三十二年(1162)从泉州、广州两个市舶收入 200 万缗,约占国库收入的五分之一。县城南门外出了许多大富商,南宋诗人刘克庄在《泉州南郭吟》中写道:“闽人务本亦知书,若不耕樵必业儒;惟有桐城南郭外,朝为原宪暮陶朱。”

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,晋江人开始到海外定居,成为晋江华侨之先驱。《宋史·高丽传》载:在朝鲜“王城有华人数百,多闽人因贾舶至者”。这里所指的闽人,多数是泉州晋江商人。在印尼,“以巴邻祁(今苏门答腊)巨港为多”。爪哇东部的杜瓶、勾栏山也是华侨的集结地。许多人到了海外,就在寓居地“先纳一妇人”,借以立足,其中有个王元懋还当上占城王的驸马。到海外定居的人多了,中外关系随之密切起来。如北宋熙宁二年(1069),由于泉州海商黄谨的引进,使中断 42 年之久的北宋与高丽的关系,获得恢复,高丽王因此把中国海商当作宋朝的使者,厚礼以待,他们派到宋朝的使臣,也大多是通过中国海商牵引的。

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,晋江的农业、手工业也获得较大的发展。如县城一带出产的丝绸可以和蜀吴之产相媲美。1975 年福建南宋黄升墓出土的两匹金丝绸,就有泉州宗正司记号,证明在宋代晋江已有高超的丝织技术。当时所生产的棉布完全代替了舶来品而被人们看好,并被当作贡品上贡朝廷。作为大宗出口的瓷器业,也大展宏图。此时,磁灶造窑烧瓷十分普遍,今经发掘的遗址就达 9 处之多,其所产的青瓷,载誉海外。制盐业方面,宋代晋江沿海有 161 处盐场,居全省首位。至于造船业,宋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记载泉州的海船“其长十余丈,深三丈,阔二丈五尺,可载二千斛粟。”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也说,泉州“海上商船,大者五千斛”。出洋的人,都到泉州集中出发。1974 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大船(一艘中等远洋帆船),具有结构坚固,抗风力强,吃水深,稳性好的特点。由此可见,两宋时期,泉州的造船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,并在当时居世界先进地位。

为适应海交贸易进出口物资的集散转运,两宋时期晋江共造了 90 座石桥,其中长度在 80 丈以上的有 9 座。建于宋绍兴八年(1138)的安平桥号称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,全长 2255 米,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梁式石桥。晋江因造桥之盛,而赢得了“闽中桥梁甲天下”的美誉。

两宋时期,晋江文教事业也发展很快,文武进士及第者共 1233 人,其中有两名状元,5 名榜眼,并有 6 人当上宰相。曾公亮这位北宋有名的贤相,他主编的《武经总要》,是一部军事史和科技史的名著。南宋状元梁克家,其所著的《三山志》,被列为宋代不可多得的优秀方志。晋江文教昌明,人文鼎盛,雄称海内。

进入元代,至元十四年(1277),即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,就在县城设置市舶司,任命阿拉伯穆斯林后裔蒲寿庚为市舶司提举,并规定“商贾市舶物货,已经泉州抽分者,诸处贸易止令输税”等一系列方便海商贸易的政策,还颁布“官船官本商贩”之法,扶助商人出海贸易,使泉州海交贸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这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百个,贸易额超过广州。“缠头赤脚半蕃商,大舶高樯多海宝”,泉州一跃成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。

海交贸易的空前繁荣,招徕了四面八方商旅。中世纪晋江县城既是贸易大港,又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,外国商人及传教士也把他们的文化习俗、宗教信仰传入晋江,使晋江文化既有中原古老文化遗风,又有外来文化痕迹相映交融的特色。同时晋江出现了既有中国古老的道教、汉化了了的佛教,又有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、中亚的摩尼教、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和欧洲的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。

元末,由于占据泉州的那兀纳的叛乱,加上明初实行“海禁”,不许“携带违禁货物下海”,甚至于成化八年(1472)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往福州,使被称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的泉州,顿时窒息了,占重要地位的对外经济贸易遭到严重破坏。然而,在生存斗争的逆境之中,有着700多年海交贸易历史的晋江,却在挫折中出现奇迹,海上民间私商乘机崛起。明朝中叶,晋江参加海上贸易活动的人,要比宋元时期更加多而普遍,并涌现出一批新兴的自由海商,尤其是安平商人,在“走私”贸易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贩海贸易这个行业,再也不象宋元时期仅是海商世家的独家行业,而是摆脱了封建政府和封建势力之控制,变成社会上各阶层乃至“山居谷汲”“田亩之夫”竞相驰逐之所。晋江的安海港由此而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私商贸易的最大港口。

海上私商贸易悄悄地兴起,一些受生活所逼的无业贫民,纷纷违禁出海到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、柬埔寨、安南(越南南部)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地。据《明史》记载:当时到菲律宾的“闽粤人以其地近且饶富,商贩至者数万人,往往久居不返,至长子孙”。虽然他们背井离乡,飘洋过海,寓居异域,被国内封建政府视为罪民,成了“海外孤儿”,遭受殖民主义者任意摧残,处境非常困难,但拳拳赤子之心,却使他们时时关心着国内的乡亲,如晋江大仑蔡氏,于嘉靖年间(1522—1566)就寄钱回乡赡养家眷、帮助兄弟建家立业。诸如此类,渐渐形成并出现了晋江的早期侨汇。

随着海上民间私商贸易的崛起,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,晋江商业性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,商品作物种植的社会化,促进了农作物专业化地区的形成和扩大。晋江以种棉花为主,因而成了“吉贝之乡”。另者,因“蔗利厚,故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”,还大量种植荔枝、龙眼、靛青等。商业性农业的发展,反过来又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达。此时,棉纺织业已是晋江妇女最主要的家庭副业。妇女们善刺绣,“或剪彩为花,或仿北土缙缡,或效西方毳毼,色色俱工”,并能生产十几种丝绸。磁灶的瓷窑,也有所变化,以烧陶器为主,“大小钵子缸窑之属,甚饶足,并过洋”。制盐方面,普遍推广淋卤滩晒法,晋江的盐业生产位居全省第二。制糖业仍是手工业中的顶梁柱,产品远销日本、波斯、欧洲。造船业,由于本地木料日趋昂贵,商人多赴东南亚各国采购木料,就地造船。这时期,安海镇“人口十余万”,“直街曲巷,无往非贸易之店肆,约有千余座”。故“市镇繁华,贸易丛集,而不亚于省城”。至明末,福建沿海连年灾荒,社会动荡,晋江灾民,又纷纷徙流海外。

清兵入闽之后,清政府为了消灭沿海抗清势力,实行“禁海”、“迁界”等残酷的镇压政策,安海镇尽成废墟,晋江私商贸易受到沉重打击。在郑成功抗清期间,晋江滨海居民大量外流,许多晋江人举家迁往台湾,亲戚互相提携,去台人数象滚雪球一样增加。他们不但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,而且也带去了传统的风俗文化,对开发台湾发挥了重大作用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复界之后,安海港很快蹶而复振,外洋大船时常泊淀于此。雍正七年(1729),清政府不得不在安海设户部税馆“鸿江澳”以榷税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4),清政府准许晋江蚶江与台湾鹿港进行对口贸易,后又批准蚶江与八里坌对口通航。晋江海商以鹿港为转口站,与日本、吕宋等国发生贸易关系。清代中期以后,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——“行郊”,在晋江沿海一带相继出现。

明清时期晋江的文化教育艺术也很有特色。境内有泉山、小山、梅石、崇正、清源、石井、

南塘、欧阳、宝海庵、正音等 10 所书院，乡间普遍设有社学、私塾和蒙馆。明代，晋江有 443 人高中文、武进士，还出了 6 名相国，9 名尚书。清代也出了 163 名文武进士。明代晋江的《易》学研究独步海内，著名的学者有几十家，著作达 98 种。其中蔡清的《易经蒙引》，陈琛的《易经通典》，苏浚的《易说》是研究《易》学的权威作品。明代大文学家王慎中，是唐宋文风的首倡人，以他的非凡才华，誉摘“一代文学宗师”桂冠。其他如何乔远的《名山藏》、《闽书》等也很有名气。而张瑞图的书画，与董其昌之作齐名。藏书家、目录学家黄虞稷的《千顷堂书目》，成为中国目录学的圭臬名著。清代军事科学家丁拱辰，他研制新式火炮和所著《演炮图说》，对军事国防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艺术方面，既保留中原文化遗韵又汲取闽南风土文化精华的晋江南音、民间乐曲、舞蹈以及梨园、木偶、高甲、打城等戏曲，到了明清时期，也盛极一时，风靡海内外。

鸦片战争之前，侵略者以鸦片开路，晋江许多村庄都成了侵略者贩毒走私的据点。随着鸦片而来的是外国商品大量输入，到处倾销，使晋江传统的棉布等手工业产品遭到严重的冲击。战后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，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晋江对外贸易停滞，手工业倒闭，加上清政府的层层盘剥，农村凋蔽，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，民不聊生。晋江人又一次像先辈一样，满怀悲愤地拖着踉跄的脚步，纷纷逃往南洋谋生，其中有不少人成为西方殖民者诱骗的“契约华工”——苦力，从而形成了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出国高潮，为晋江后来成为福建，乃至全国著名侨乡奠定了基础。在这个时期，晋江人有华侨关系的日益众多，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侨汇的社会特点越来越突出。

辛亥革命期间，海内外晋江人积极参与。晋江华侨纷纷在居住国参加同盟会组织，并慷慨解囊，以巨资资助革命，而深受孙中山赞誉。还有不少晋江籍华侨回国参加光复斗争。1911 年 10 月，泉州同盟会成立统一领导机构，以印尼华侨蒋以麟为会长。11 月 7 日，安海革命党人发动群众暴动，打响辛亥革命在福建的第一枪，宣布安海光复。11 月 18 日，晋江县城光复。辛亥革命失败后，晋江陷入军阀混战局面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压迫下，人民生活更加艰难。晋江人为谋求出路又成批出洋逃生。

为救国拯乡，晋江海外侨胞试图走“实业救国”道路，他们开筑公路，创办汽车运输公司、海运公司、电灯公司、农场、工厂企业和兴办新学、医院，乃至施医、舍药、助棺、恤邻，希望祖国强盛，家乡人民安居乐业。然而，“实业救国”也不能使晋江人民摆脱苦难。

1921 年，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，《新青年》、《向导》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始传入晋江，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创办社团、报刊，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。1927 年 1 月，中共泉州特别支部成立，中国共产党晋江县地方组织诞生了，工农民众组织工会、农会，减租减息斗争，如火如荼。4 月，泉州“四一〇”反革命事变后，泉州国民党实行“清党”反共，晋江革命斗争转入低潮。1929 年 5 月，中共泉州县委成立，领导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“五抗”（即抗租、抗税、抗粮、抗捐、抗饷）斗争。1934 年 4 月，在中共晋南县委领导下，组成晋江第一支武装队伍，翌年 4 月，扩编为晋南游击大队，开展游击战争，与国民党的反共剿共政策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，在中共晋南工委领导下，1938 年 5 月，成立有 2000 余人的抗日群众武装组织——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。继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同国民

党顽固派进行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斗争,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抗战期间,海外晋江爱国华侨均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。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侨汇断绝,晋江侨乡人民陷入严重困境,生活十分悲惨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民党发动内战。晋江人民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下,开展反“三征”(征兵、征粮、征税)、反“清乡”斗争。同时组织武工队、游击小分队、泉州团队,开辟游击区,开展游击战争。1949年8月31日,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县城泉州。9月4日,晋江全境解放。

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,广大晋江人民勇敢战斗,前赴后继,董云阁、李子芳、沈尔七、许运伙、尤大斧等一大批优秀儿女,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1949年9月9日,晋江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。然而国民党留下的旧晋江,经济衰竭,交通破坏,匪乱如毛,时疫蔓延,投机猖獗,通货膨胀,年人均粮食176公斤,人均年收入只有45元,整个社会经济濒临破产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晋江行政区划历经了几次析变:1951年析城关及其近郊置泉州市(今鲤城区),县治迁至青阳镇,70年代初又析晋北3个公社和1个农场归泉州市,1988年析出4个乡镇置石狮市。1992年3月6日结束了1275年县建制的历史,成立了晋江市。

43年来,晋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伟大、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,经历了1949—1978年和1978—1992年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。

1949—1952年,全县开展剿匪反霸、禁毒清毒和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、抗美援朝三大运动,进行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斗争,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,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,实现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。1952年底,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551万元,比1949年增长61.64%。交通运输、财政贸易、文教卫生均有迅速发展,社会安定,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。

1953年以后,晋江在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,针对历史上农业生产水源紧缺、常年干旱、风沙危害等实际情况,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营造防风沙林带。1954年8月,组织上万民众,自南安县金鸡桥下新辟金鸡水渠,引晋江水与原晋东水渠相接,并筑堤防洪,实现了自明朝以来数百年晋江人民梦寐以求的“破金鸡,灌晋南”的夙愿。至60年代末,全县建成大小水利工程3000多处,其中以新垵水库、石壁水库(和南安县合建)为最大。70年代,随着山美水库的建成,先后在灌区内建成5大电灌站,共修建0.5立方米/秒流量的水利干渠381公里,外引客水2.61亿立方米,占实际可利用水量的78.3%。全县有效灌溉面积42.73万亩,占耕地总面积的80%。与此同时,在风沙严重的晋东沿海一带营造防风固沙林和农田防护林,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,挡住了风沙,保持了水土,改善晋江生态环境,促进农业稳产高产。在这期间,晋江还进行农业耕作制度改革,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使全县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恢复与发展。其中1950—1952年,全县农业总产值,平均每年递增18.38%;1953—1957年,平均每年递增7.73%;1958—1962年,由于“大跃进”、“公社化”、浮夸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,使全县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8.76%;1963—1965年,经过几年的调整,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;1966—1976年,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干扰和破坏,发展缓慢。至1978年,全县农业总产值为1.47亿元,比1949年增长4.1倍,平均每年递增5.81%。

据 1978 年统计,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 2.3873 亿元,比 1949 年的 3433 万元增长了 5.95 倍,其中工业产值 9200 万元,比 1949 年的 580 万元增长了 14.86 倍;社会商品零售额 1.2807 亿元,比 1949 年的 4189 万元增长了 2.06 倍;财政收入 1476 万元,比 1950 年的 387 万元增长 2.8 倍;农民人均年收入 107 元,比 1949 年的 45 元增长 1.38 倍。人民生活有了较大幅度提高。此外,渔业、交通、邮电、电力、文化、卫生等发展迅速。尤其教育事业发展速度更快。自清末民初废科举、兴新学之后,晋江的学校教育虽有一定发展,但至 1951 年市县分治(即不含今鲤城区)时,境内也仅有中学 4 所、学生 1042 人,小学 201 所、学生 34499 人。而至 1978 年,全县则发展到中学 27 所、学生 35518 人,小学 412 所、学生 123940 人,学校数与学生数均出现几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。同时,向全国大专院校输送 1800 余名合格新生,并为后来造就了众多教授、专家、学者。

1949 年至 1978 年的 29 年中,晋江以发展农业为基础,全面恢复、调整、巩固、发展国民经济,使晋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社会出现了长足的进步,尤其是粮食产量获得了较大的增产。然而,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海防前线,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海峡两岸人为的严重对峙,战备需要延缓了工业建设步伐,由于“左”的思想影响和 10 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干扰、破坏,由于人口的不断急剧增加、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恶性循环,加上长期推行单一经济模式的制约,使晋江仍然是个封闭的农业的“高产穷县”。获得新生的晋江人,远未在这块“生我养我”的土地上完全摆脱贫困,寻觅到致富之路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晋江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,继落实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完成农村第一步改革之后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,如同春风化雨一样,滋润了晋江南岸这块贫瘠的赤土地,并使之生机勃勃、郁郁葱葱。富有博采、开拓、进取精神的晋江人,终于冲破了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羁绊,以乡镇企业为龙头,外向型经济为导向,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,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全面发展,使晋江社会发展,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乃至精神面貌均发生了历史性巨变。

1978 年底,陈埭率先出现了利用侨乡闲散的资金、房屋、劳力,联户创办企业。1979 年,全县各乡镇纷纷仿效创办,摸索前进。1980 年 8 月,中共晋江县委从县情实际出发,毅然选择扶持乡镇企业作为振兴晋江经济的重大决策,颁发了《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》,明确允许社员集资办企业,允许雇工、允许股金分红、允许推销提成、允许价格随行就市以后,全县乡办、村办、联户办、个体办企业如春潮涌动,迅猛崛起。一年中,联户办企业就创办 500 多家。当年,晋江第一次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历史性变化。

以大办乡镇企业为契机的同时,1978 年底,晋江开始与外商签订“三来一补”合同,承接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件装配等业务。1982 年起,晋江积极引进外商投资,创办“三资”企业(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、外商独资)。1991 年又出现了外资成片土地开发热潮。福埔、安平 and 深沪东海垵三大片综合开发区总面积达 4880 亩。

至 1992 年底,晋江乡镇企业总数 2.16 万个,为 1978 年的 18.93 倍,创办市、镇级工业小区 40 个、村级工业小区 20 个,市内从业人员 26.54 万人,占农村劳动力总数 58.29%,吸纳外来劳工约 18 万人。乡镇企业总收入 48.42 亿元,比 1978 年 3453 万元(不含石狮市)增长了 163.36 倍。乡镇企业总产值达 56.35 亿元,占全市全年社会总产值的 74.25%,位居全

国县(市)级第28位,福建省首位。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超亿元的镇有14个、村6个、企业1个,超千万元的村101个、企业46个。乡镇企业跃为晋江国民经济主要支柱。至1992年,晋江共对外签定“三来一补”合同19993份,有4000多家企业先后承接过来料加工装配业务,消化城乡富余劳力4万多人。实收工缴费3912万美元,占泉州市各县市工缴费收入的一半以上,占福建省工缴费总收入的40%以上。至1992年,晋江累计批准三资企业903家,实际投资13.99亿元,利用外资2.0437亿美元。外商从以港澳台为主逐渐扩展至东南亚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加拿大等13个国家和地区,跻身于国际市场的产品有电子、机械、建材、塑料、纺织、服装、食品、鞋帽等20多类,1000多个品种。至1992年福埔、安平 and 深沪东海垵三个土地成片综合开发区已破土动工,资金投入总数达1788万美元,占注册投资金额的40%。同时,晋南开发区也初具规模。镇村级29个工业小区开始起步,共建成标准厂房30万平方米。

乡镇企业的崛起,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晋江经济的第一次飞跃。而成片开发区的建设,则标志着晋江对外开放正向大资金、高技术、多行业和群体化方向发展,实现晋江经济的第二次飞跃。晋江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,正向综合开发区、三资企业小区、乡镇企业群为主体的多层次、多功能、多形式的外向型经济新格局发展。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轻型产业结构,正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转变;以中小型为主的企业结构,正在逐步形成区域化专业生产经营格局,并逐步向企业集团公司发展。“晋江模式”、“晋江速度”、“晋江效益”令世人所瞩目。

随着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迅猛发展,晋江国有工业生产也在大踏步前进。一些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工业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,适销对路的花色品种有较大的增加,有数十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。传统的通草画、锡雕、珠绣拖鞋、竹编、福绣等工艺品驰名中外,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衙口花生、泉成肉饼、安海食珍糕等名牌土特产品备受青睐。各种精美服装、鞋类吸引着广大的消费者。至1992年,全市工业总产值(含乡镇工业企业)达54.45亿元(1990年不变价),比1978年增长了58.18倍。工业与农业产值的比重1949年为16.89:83.11,1978年为25.4:74.6,1992年则为89.64:10.36,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为适应乡镇企业与外向型经济的腾飞,改革开放以来,晋江对制约经济发展的能源、邮电、交通等设施加强建设,集中财力改善投资环境。先后筹资完成罗山和龙湖2个110千伏输变电站的投建工作;引进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日本富士通F—150C程控电话设备;新建东石300—500吨级栈桥式码头2个,以及深沪5000—7500吨级散杂货兼集装箱码头1个。至1992年,全市2个110千伏输变电站先后投入运行,全年供电量达5.5亿千瓦时,比1978年增加30.09倍;全市程控电话总容量达1.92万门,为1978年“摇把子”电话机总量的14.5倍,用户可直拨全国400多个城市以及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,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电话程控化;全市公路通车里程596.64公里,比1978年增加317.94公里,并以平均每百平方公里通车里程87公里的密度居全国榜首,客货运汽车可直通全省各地以至广州、深圳、温州、上海等地,东石码头成为可直航香港的起运点,新的水陆交通网络正在逐步形成。

改革开放以后,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,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广泛的商品流通渠道,也